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中古史卷

本卷主编 单国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单国铨

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可说源远流长。从16世纪末开始,西方知识圈子,首先通过在华传教士的关系,已不断出现有关中国国情和历史的书籍。诚然,无论是最早期的“汉学”(Sinology)著述,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著作,西方的中国史研究都无法避免或多或少反映出不同时代西方知识界(以至社会)对中国的情意结。但即使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在选题、研究方法以至读者取向方面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在学术无国界的前提下,要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史学家,新一代的学者不单只有责任利用最丰富的史料去厘清中国历史传承的脉络,还必须尽量参考和结集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成果来协助解说中国历史与世界史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的一册,本书的主要目的固然是把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研究介绍给读者。但在扼要讨论所收录文章之前,我想特别指出,本书的任务不单只是把有启示性或开拓性的论文翻译过来,更希望通过翻译,能把不同概念引申出来的问题突显出来。就以“late imperial China”这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普遍应用的概念为例(关于“late imperial”一词的历史,可参看司徒琳[Lynn Struve]编《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4年,序论部分;中译本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史译丛》第四辑),虽然在本册我们往往顺理成章

地把这个词翻译成“帝制时代晚期”或“晚期帝制时代”(但非“帝国时代晚期”),但很明显“late imperial”这一概念与中文著述里常用的“明清时期”或“元明清时期”是有基本的分别(简单来说,前者重点是放在社会经济转型而非朝代转变上)。我想说明的是,不论是“late imperial China”还是“明清时期”,每一个历史概念背后都有一套理论和假设。若本册所选收的论文能重新引起读者审视不同概念背后假设的兴趣,那我们的目的也可算达到。

本册收录了12篇近40年来北美学者有关中国帝制时代(尤其是从魏晋南北朝到清代)的历史论文。当然,作为一本选集,本书不可能全面反映西方学术界在中国史研究各个领域取得的成果(关于妇女史、思想文化史及宗教史的研究,读者可参看本丛书其他分册)。但值得说明的是,本册收录的文章不单只在理论建构或史料运用上各有其启示性,作为一个整体,它们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近年西方中国史研究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两个中心关怀。要了解这些论文的代表性,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中心关怀作一简要说明。

首先是关于时间(或时代)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固然一向有不同的断代方法,但总体来说,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传统史学主要仍然是以朝代(如唐、宋、明、清等)为基本研究单位。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虽然亦承继了这个以朝代为本的断代传统,但近几十年来,学者亦往往尝试从不同角度去划分中国的历史时代。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史学研究的多元化,西方中国史研究的重点亦从政治、制度转移到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题目上。固然,朝代兴衰仍然是中国历史转变的重要因素,但在社会、经济、文化史等范畴,一个有意义的历史时代,正如个别收录在本册的论文指出,不一定是与朝代更替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虽然近年西方学者已绝少再把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强套在中国历史上,但西方的中国史学家仍然要面对一个似乎无法避免的挑战,即如何把中国的历史时间与西方(主要是欧洲)的历史时间作有启示性的比照。这一挑战的困难所在不是三言两语在一篇序论中可以说得明白的,但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西方的中国史学家对现在

常用的时代概念(如“medieval”[中世]、“early modern”[早期现代、早期近代、近代初期]、“modern”[近代、现代]等)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要跳出这个以欧洲历史经验为主体的断代框架,学者似乎仍需要在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全球史(global history)方面作出新思维。

接着是有关空间(或地域)的问题。这个中心关怀可说有两个相关范畴。第一个是关于“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或地域的定义。中国(无论怎样界定)不但幅员广阔,其版图亦因时而异。但历史上何谓“中国”这问题,在正统观念影响下,似乎并未在传统史学引起特别关注(关于中国传统历史疆界,可参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1974—1976年)。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固然有受到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对不少西方学者来说,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或经济个体,其实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产物。对他们来说,研究中国历史就是研究“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或实体在历史上形成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国家作为一个历史产物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可说已是一个共识;可参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我说[Verso]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有关地域的第二个范畴则涉及中国对外关系。在传统史学,中国与所谓外族(如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的关系固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对许多西方的中国史学家来说,中国民族史、边疆史、对外交通史等不单只是重要的课题,更是要了解广义的“中国”的必经之路。对他们来说,研究中国历史其实就是要研究中国在文化、地域上的多元格局(借费孝通语;关于类似见解,可参看韩森[Valerie Hansen]著《开放的帝国》[*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诺顿[W. W. Norton]出版社,200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

本册收录的12篇论文,有概论亦有专题研究。最早的一篇应该是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 Jr., 1934—1984年)在20世纪70年代写成的《整合史:早期现代(1500—1800年间)的平行发展与相互联

系》(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而最近期的则是韩森为其新著《丝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撰写的序论。本册可分为两部分,而每部分每两篇文章亦可自成一组。第一部分两组四篇文章,性质和读者对象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理论层面上都直接反映了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上时与空的中心关怀。第二部分四组的八篇文章,其编排一方面是考虑到时代的先后和分布,另一方面则考虑到文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下让我对每组文章作一扼要的介绍。

本册以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年)著《中国历史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和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著《内亚史上的国家形成与阶段划分》(*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两篇各具规模的文章为起首。前者载于《亚洲研究集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44卷(1985年)第2期,原为施氏在1984年度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所发表的会长演辞。对本书的读者来说,施坚雅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施氏的本行虽然是人类学,但从其最早期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著作开始(如《泰国的华人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7年),他的学术就一直和历史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其众多著述中,中国学者较为熟悉的大概是《中国农村的市场及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亚洲研究学会,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及其编著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中华书局,2000年中译本)。前者施氏在应用地理学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的同时,亦引用了大量史料和数据来分析近代四川地区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他指出,至少在四川地区,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包括物资和资讯的流通)和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帝制晚期的城市》虽然是一部论文集,但施氏为该书撰写的五篇论文(共超过200页)其实已有一

部专著的雏形。五篇论文不但材料丰富,引申的问题亦相当广泛,其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传统城市的功能、分布以至兴衰,往往须从区域系统(甚至宏区[macroregion]系统)的角度去分析才能完全了解。《中国历史的结构》可说是集施氏个人研究大成的一篇巨著。虽然文章篇幅不长,但通过其宏区理论,施氏不但尝试解释个别宏区的结构和发
展周期,并借着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步伐来说明,要彻底了解中国历史的结构,学者不但须从宏观角度去审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还必须细心检视区域之间发展的差异及其相互间调适的过程。尽管学者对宏区理论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施坚雅对中国历史上时(发展周期)与空(区域系统)的反思,影响无疑是既深且远。值得一提的是,直至他2008年秋去世为止,施氏仍以80多岁高龄一直埋首有关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中国历史的结构》虽然已是20多年前的著作,但为了本册的出版,施氏不但亲自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补,还特别利用新的数据重新绘制出三幅地图。施老对学术孜孜不倦的精神,确实是学者的典范。

狄宇宙《内亚史上的国家形成与阶段划分》一文,原载于《世界史学报》(*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10卷(1999年)第1期。狄氏的专业虽然为内亚历史,但内亚族群与中国历朝的关系一直是其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狄氏的学术有几项特点:第一是他在内亚史和中国史研究两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他不仅是新近出版《剑桥内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的编辑之一,亦是《剑桥中国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撰稿人之一)。第二是其研究范围是从古代(如《古代中国及其敌人》[*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直延伸至清代(如《17世纪中国一个满兵的日记》[*The Diary of a Manchu Soldi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My Service in the Army," by Dzengšeo*], 绕梁[Routledge]出版社,2006年)。第三是在史料运用方面,狄氏不但能够利用多种语言(包括蒙古文和满文)的文献,还往往

参考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内亚史上的国家形成与阶段划分》和施坚雅的《中国历史的结构》一样,是一篇极具规模的通论。虽然文章的重点是历史上内亚政体形成的成因(尤其是不同时代不同族群要面对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但对中国历史稍有认识的都会明白到,至少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历史和内亚历史的关系,实在是很难分割。如果说施氏《中国历史的结构》主要是关心中国历史的内在结构,狄氏《内亚史上的国家形成与阶段划分》则是从宏观角度去检视中国历史的外在律动。

尽管施、狄两文都各自对历史断代作出了反思,本册第二组两篇论文,即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中世性与中国人的历史观》(Medievality and the Chinese Sense of History)和伍安祖(On-cho Ng)著《“早期现代性”作为纪元概念与清代思想史》(The Epochal Concept of “Early Modernity” 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无疑更清楚反映出西方中国史学家对历史分期的关怀。卜氏的专业是明代史(其两部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三联书店,2004年中译本]和《明代的社会与国家》[*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绕梁出版社,2004年;黄山书社2009年中译本]),但亦一直有关心如何从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关于这方面,可参看其《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新星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和《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17世纪全球贸易》[*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Bloomsbury出版社,2008年;远流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中世性与中国人的历史观》一文原载于《中世史学报》(*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第1卷(1998年)第1期,为该刊创刊号特以“中世”或“中世性”为主题的其中一篇。本文主要指出,“中世”(medieval)或“中世性”(medievality)作为一个欧洲史学概念,其功能归根究底还是用来与“近代”(modern)或“近代性”(modernity)

作对照。相对来说,尽管中国史家在 17 世纪或更早已展现出一套“自觉的历史观”(self-conscious sense of the past),他们并未有如欧洲史学家般把“中世”和“近代”历史观作出彻底分辨的需要。卜氏最后指出,与其以“中世”作为放诸四海皆准的概念,史家倒不如认真留意在欧洲中世时期世界各地的历史发展。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无谓的概念混淆,史家亦可更清楚了解欧洲中世纪特殊之处。

伍安祖《“早期现代性”作为纪元概念与清代思想史》一文,原载于《世界史学报》第 14 卷(2003 年)第 1 期。伍氏的专业为中国(尤其是明清)思想史,但其研究亦涉及西方哲学和诠释学。伍氏的主要著作包括《清初的程朱儒学》(*Cheng-Zhu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Qing: Li Guangdi [1642—1718] and Qing Learning*; 纽约州大学出版社,2001 年)及与王晴佳(Q. Edward Wang)合著的《世鉴:中国传统史学》(*Mirroring the Past: 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 年)。前者是以清儒李光地为研究中心的一部思想史专论,而后者则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史学史通论。在《“早期现代性”作为纪元概念与清代思想史》一文,伍氏通过比较思想史来审视“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这个概念的通用性。本文主要指出,在 17、18 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思想家虽然都有对类似问题(如知识的本质、历史的自觉、道德的根源等)作出反思,但归根究底,清代学者的中心关怀及其面对的挑战,还是跟欧洲学者的经验大相径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 17、18 世纪亦可算是一个纪元,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清代应否被视为早期现代的另一版本,似乎还需要深究。伍氏的结论也许不在意料之外,但作为一篇较有系统的比较史研究,本文在方法上还是值得学者细心参考的。

前文提到,本册第二部分收录的八篇论文,其选编一方面考虑到作者对中国过去时、空的探讨,另一方面亦有顾及到朝代的次序。第三组的两篇文章,尽管性质和关怀各异,亦可说从不同角度反映出近年西方学者研究汉、唐之间一段历史的新思维。《文化与权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世界的瓦解与重建》(*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

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在2001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而本册所收的是三位编者为该书所作的导论。三位编者之中,裴士凯(Scott Pearce)和司白乐(Audrey Spiro)是研究六朝社会、文化史的专家。前者的论文散见主要学报,而后者则著有《思古:早期中国人像的美学及社会问题》(*Contemplating the Ancients: Aesthetic and Social Issues in Early Chinese Portraiture*;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伊沛霞(Patricia Ebrey)近年虽然集中研究宋代史(其较近期的著作有《聚积文化:宋徽宗的收藏》[*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华盛顿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但其早年有关中国大族的研究(《中国早期帝制时代的贵族》[*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仍然是一部值得学者细读的专论。《文化与权力》是西方近年少有的一部专注魏晋南北朝的论文集。编者在序文归结近年研究成果,指出过去一般将本时期视为汉、唐之间一段既复杂且混乱的历史的看法,其实早应予以修正。通过近年大量涌现的考古报告以及对过往受忽略的文本的新解读,编者指出,学者不但逐渐了解到魏晋南北朝在宗教、文学、艺术、商业及政治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亦逐渐明白到过去以族群身份为分析单位的做法其实未能充分反映当时中国社会上族群与文化的杂糅。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西方研究魏晋南北朝(尤其在宗教、文学和艺术史范畴以外)的学者为数不算多,《文化与权力》及另外两部近年出版的通论(即丁爱博[Albert Dien]的《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和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帝国之间:中国南北朝时代》[*China between Empire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亦可说反映了西方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可观成就。

如果说《文化与权力》的焦点是华夏世界的内在转承,韩森新作《丝路新史》重点之一则显然是中国早期的对外交通。正如上文提到,韩氏研究其中一个主要关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多元格局。除《开放

的帝国》外,韩氏的主要著作还包括《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及最近出版的《世界历史上的旅程》(*Voyages in World History*;沃兹沃思[Wadsworth]出版社,2010年)。韩氏著作的特点是其对考古材料的特别重视。从收录在本册的序文可见,《丝路新史》一书是依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来重新审视“丝绸之路”的历史。韩氏新著能否彻底改变我们对丝路的认识,现在还言之尚早;但不可否认,丝路历史之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中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货物和技术交流的主要渠道,更因为它在东西文化(包括思想、宗教、艺术)传播所起的关键作用。一部新的丝路史,不仅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与欧洲之间各式各样的社会和人物,更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中西交流在中国历史中(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降)的重要性。

在西方中国史学界,唐、宋两代一直是较受重视的历史时期。本册第四组选收的两篇论文,分别是郝若贝(Robert Hartwell, 1932—1996年)著《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和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著《宋、元、明的过渡问题》(*Problematiz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前者载于《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2卷(1982年)第2期,而后者则是史氏为其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合编《中国历史上之宋、元、明过渡》(*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年)所写的序论。在西方中国史学界,郝若贝可说是一位传奇人物。尽管郝氏正式出版的专书不多,其散见主要学报的论文,不单大多篇幅详尽、材料丰富(本册所收的一篇,原文有78页长),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更是既深且远。郝氏研究的主要关怀是中国中世(尤其是宋代)的社会及经济变迁,其著作的特点是以大量文献和数据来

支持每一主要论点。事实上,郝氏可说是在西方利用电脑科技制作有关中国历史的数据库的先驱之一。近年以哈佛大学为发展基地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无论是间接或直接,其实都可说是建基于郝氏的早期研究。此处收录的《750—1550年间中国之人口、政治及社会变迁》,是郝氏后期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亦可说是他早年著的《中国帝制时代一个经济转移周期》(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 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 750—1350;《东方经济及社会史学报》[*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10卷[1967年]第1期)的一个延续。若说郝氏早年的一篇文章是以开封地区的地域性经济转移为个案研究,其后的一篇则是以更多元化的史料和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唐中叶至明代之间中国不同地域的人口、政治及社会变迁。尽管本文一些结论(如人口南迁的趋势、中央职权的地方化、地方士绅的冒起、地域之间发展的差异等)已成为新一代史家的基本常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郝氏(和他的门生)为建立这些“基本常识”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基于种种原因,即使前辈学者如郝若贝早已留意到唐、宋、元、明四代之间发展的连贯性,史学者在研究中国帝制时期时,还是往往偏重唐宋或明清两段时期,而忽略了宋、元、明之间的历史发展。《中国历史上之宋、元、明过渡》一书之编纂,正如史乐民在其序论指出,目的之一是鼓励学者不再视蒙人治下的元朝为不可逾越的历史分水岭(史氏作为郝若贝的门生,也许并不是一个巧合)。史乐民的专业为宋、元、明时代的社会及文化史。除著有《给天府的重担:1074—1224年间马匹、官僚与四川茶业的崩溃》(*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哈佛大学亚洲中心,1991年)外,史氏还是《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5(宋代)卷的编辑。在此处收录的序论,史氏不但肯定了中国在唐宋时期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出现的重大转变,还特别指出晚期帝制时代(尤其是有清一代)的种种发展,其实都可说在不同程度上承继了宋、元、明时期的脉络。

换句话说,史乐民指出,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事实上应被视为进化性(evolutionary)而非彻底性(revolutionary)的转变。

本册第五组两篇论文,分别是罗友枝(Evelyn Rawski)著《帝制晚期文化的经济及社会基础》(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ulture)和傅礼初著《整合史:早期现代(1500—1800年间)的平行发展与相互联系》。前者原载于罗氏与姜士彬(David Johnson)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合编的《中国帝制晚期的民间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而后者则原为未刊本,在傅氏辞世后才在《突厥研究集刊》(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第9卷(1985年)发表。尽管两篇文章所关心的时代类似,其中心关怀却不尽相同。罗友枝是亚洲研究学会的前会长,亦是近年西方“新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除著有《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等书外,他与何炳棣(Ping-ti Ho)教授在《亚洲研究集刊》的对话(分别载于第55卷第4期和第57卷第1期),更是近年西方清史研究一次较具代表性的辩论。此处收录的是罗氏早年的一篇文章。《中国帝制晚期的民间文化》是一部极具分量的论文集,其作者主要关心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上“文化”的产生及其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传播。作为论文集的一篇导论,罗氏一文的目的一方面是指出帝制晚期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特色(这包括经济的快速增长、教育的相对普及化和印刷事业的扩展),另一方面则是指出这些发展虽然促使中国文化的统一,但亦同时促成社会上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

若说罗友枝一文的主要贡献是点出帝制晚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特色,傅礼初著《整合史:早期现代(1500—1800年间)的平行发展与相互联系》目的之一则显然是希望透过世界史或其所谓整合史(integrative history)的角度去加深了解明清时期的历史。傅氏英年早逝,生前是哈佛大学中国及内亚史教授,不但精通多种语言,研究范

围更是异常广泛,包括蒙古史、清史以及早期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联系。尽管傅氏生前出版的著作不多(其中大部分已收录在《中国与伊斯兰内亚史研究》[*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集成[*Variorum*]出版社,1995年),但不少论文到现在还被广泛引用。此处收录的是他一篇大概在70年代写成但在生前并未发表的论文。在这篇在西方中国史学界广为流传的论文中,傅氏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在当时很少学者会留意的问题:究竟是否可以用“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来描述16至18世纪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还是“早期现代”这个概念只适用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尽管近年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已作了不少讨论(可参看本册伍安祖一文或前文提到司徒琳编《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的序论),傅氏以独有的视野对不同地区的平行发展(parallels)和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s)作出的观察,还是值得新一代学者细心玩味。

本册最后一组两篇论文,分别是柯娇燕(Pamela Crossley)著《中国治权的多面性》(*The Rulerships of China*)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对帝制晚期中国经济的反思:1730年前后—1930年间的发展、崩解和衰退》(*Re-thinking the Late Imperial Chinese Economy: Development, Disaggregation, and Decline, circa 1730—1930*)。前者原载于《美国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7卷(1992年)第5期,而后者则载于《行程》(*Itinerario*)第24卷(2000年)第3—4期。尽管两篇文章无论在题材还是方法上都截然不同,从不同角度它们都反映出近年西方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关于清代)的新方向。和其他致力“新清史”研究的学者一样(关于所谓 new Qing history,读者可参看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前卫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2004年第88期发表的回顾),柯娇燕主要关怀之一是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清皇朝与中国过往其他朝代其实是有很重大的差异。尽管传统史学家往往顺理成章地把清代视为明代的延伸,柯氏在收录于此处的文章(原为一篇“书评论文”[review article])中指出,和明代或以前的皇帝比较,清代君主显然更着意展示自己同时作为中国传统皇

帝与内亚地区不同族群的共主的两重身份。明、清两代是否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个问题,学者固然有不同的见解,但无可否认的是,柯氏一系列有关“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作为一个近代概念的著作(包括其《昧晦之鉴:清代皇权意识下之历史与身份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确实对近年西方“新清史”研究有很重大的影响。

彭慕兰有关中国帝制晚期及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国内学者其实已有不少专文介绍。本册收录的是他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其内容与他同年出版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巨流,2004年繁体本)可说互相呼应。彭氏在本文中指出,18世纪中叶前的中国,无论在营养、消费、生活水平、生态环境各方面,都不逊于同时期的欧洲。但在该世纪中期以后,由于中国国内远程贸易逐渐失去其重要性,加上沿海地区又因外来影响而未能维持以往的经济增长等因素,使得原先的经济成长无法获得支撑;再加上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政府越来越无力提供关键支援,到19世纪个别区域的衰退情形遂变得更加严重。最后,鸦片、太平军以及西方强权带来的影响不但侵蚀了晚清政府的治国基础,还使中国最终由原先的繁华富庶,变成为19世纪末人们眼中的贫困模范。彭慕兰有关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观点,国内外学者已多有评论。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其中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分析中西(尤其是欧洲)历史发展的分歧。彭氏对清史研究的贡献,正是他勇于利用新的比较角度去审视中国的历史经验。

本册得以完成,要感谢姚平教授的鼓励和鞭策,更要感谢原文作者的协助和各翻译者的努力。特别要提到的是郭威廷学弟,他不但负起了翻译彭慕兰一文的责任,更对本册各论文的修订作出了种种贡献。本册的修订工作,较原先想象要复杂得多。复杂的原因有很多(如何统一一些主要概念的翻译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我只想说明的

是,尽管参与本册编订的学者已尽量遵照信、雅、达的要求,但无可避免各篇翻译仍存有不少错误或漏洞。对个别文章有特别兴趣的读者,有机会还是应该参考作者的原文。

最后,谨以本册献给两位已故老师。我在这里虽然并未选收牟复礼(Frederick Mote;1922—2005年)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另译崔瑞德;1925—2006年)两师的论文,但对西方中国史研究稍有认识的读者来说,两位大师的名字亦应当不会陌生。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牟氏和杜氏除了在各自研究范畴(前者为元、明、清史,而后者则为唐史)有重大贡献外,在推动西方中国史研究方面,亦在不同层面起了关键作用。牟、杜两氏皆深信学术无国界,若然本册能成为中西史学交流一道小小的桥梁,亦可算是对两师的一份薄薄的回报。